



一位朋友从希腊归来，在餐桌上谈起雅典，对古代的巴特农神庙，一脸崇敬，谈起当今雅典的现代建筑，一脸的不屑和轻视。朋友说，中国现在一般的中等城市的现代建筑，都要比雅典的现代建筑优雅考究。

我也访问过希腊，在雅典小住过5天。开始，我也和那位朋友一样，对雅典现代建筑的平凡、陈旧很不以为然。雅典除了奥运场馆是新建筑，好像没有别的建筑是崭新的、金碧辉煌的。然而随着访问的深入，我最终改变了看法。

原来，希腊地面上的现代建筑很不起眼，地面之下的管道，污水收集系统都是密如蛛网，工业废水、生活污水，都是在可控的地下管道中流淌，一直流进污水处理厂，经过无害化处理后，再重新流进江河湖海。哪怕是在希腊的农村，每家农户的房子底下，都建有集污管道，生活污水全部流进管道，一点也不会污染农田，更不会污染江河。

仔细想想，现代化程度并不高的希腊，能够在全国建起这样一个巨大的地下工程是多么了不起啊！难怪爱琴海水碧蓝碧蓝，清澈见底，难怪游客会说，不爱爱琴海，不算去过希腊。

反观我们中国，不要说大城市，就是中等城市的街头，也是耸立着巨大的簇新的金碧辉煌的现代建筑，玻璃幕墙在阳光下反射出强烈的折光，难怪有些西方游客走进中国的大中城市一看，会怀疑中国究竟算不算发展中国家。

但是，中国城市地下的污水收集系统建设的滞后会告诉这些西方游客，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广大农村的地下污水收集系统更是一张白纸，尚未开笔呢。所以，中国的环境污染会如此严重，全国所有的大江大河都遭受严重污染，湖泊的情况更危险，太湖蓝藻的集中暴发，滇池、巢湖的严重污染都在向我们敲警钟：再也不能向湖泊江河中倾倒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

了，必须从现在起就重视地下污水收集系统的建设，否则的话，我们就会陷入一个荒谬的悖论：住在江河湖泊边上金碧辉煌的高层建筑里，银行里也许有7位数的存款，但却喝不到一杯干净的水，只能每天闻闻水面上散发的臭气，这难道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吗？

也许有人会说，先污染，再治理是规律，发达国家也是这么走过来的。不能说这种观点毫无道理。但是，中国的国情特点是：人口稠密而生态系统脆弱，生态环境已经不能承受日益增多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环境现状已经触及到人口生存的底线了。如果我们有美国、俄罗斯、加拿大那样的本钱，如果中国也是地广人稀，环境稍微污染一下问题还不大，就像我们的长江，沿江十几座城市都在往长江里排污，因为长江水量大，自净能力强，水质至今还是过得去的，但如果一直朝江中猛排污，也许用不了多久就会变成第二条黄河。

我觉得，中国城市现在地面上的建筑，就是和发达国家比也不能算落后了，但地面以下的污水管道建设，却不知要落后多少年！能不能从现在开始就向希腊学习，更加重视在地面以下追赶上发达国家，先从城市的地下修建污水管道，将所有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都收集起来，经过无害化处理后再重新排放江河，然后再在小城镇、农村也开始修建污水管道，在地底下建起一张巨大的污水管道网，一张地底下的治污“互联网”，一点一滴地持之以恒地积年累月地坚持下去，这张地下“互联网”是一定可以建成的，中国的江河湖海像希腊、像所有发达国家那样清澈见底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据报章披露，收词1.5万多的《上海话大词典》即将问世，这对于传承上海话无疑是大好事。不过，书未出而声先闻；在“先闻”之中，笔者却发现了一个小疑点——有报道介绍这部大词典时举例说：“如‘削生梨皮’的‘削’，上海话念qi，这次收入时为‘粢’。”这个字例当然不是记者自说自话地写上，而是由该词典主持者当作范例提供的。笔者认为：选取这个“粢”不合适，理由如下：

《辞海》对“粢”的诠释是：(1)古代用木削成以备书写的版片。……引申为刻本。如宋椠、旧椠。(2)简札，书信。可见“粢”指为物——书写版片、刻本或书信。当然从“粢”字的上“斬”下“木”来看，它原本似也作为一个动词，即王充所说的“断木为粢”。但这也明白可以看出，曾作动词的“粢”是指“砍”(即“斬”)，而不是“削”。试问，要把生梨的皮去掉，能用刀来砍或斩吗？当然不能。

顺便说一句，削掉生梨、苹果之类的皮，上海话也不是说qi，这个动词的读音不是“几妻”韵，而应是“烟鲜”韵，即与“干”同音。

事实上，意为“削”而音如“干”的字，早有现成的了，这就是“扞”。也是在《辞海》中，“扞”的义项之一是：“吴方言，修剪之意。如扞脚。”我们知道，扞脚主要就是扞掉脚上的皮(死皮)。同是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汉语词典》，它对“扞”的释义，其中一项便是：“[方] 削；剪：扞脚苹果要扞掉皮再吃。”这里说的“方”当然是指吴方言，而其所举的语例(苹果扞皮)，更是明白无误。“扞”用作上海话的一个动词，确实很合适，把生梨、苹果的皮削掉，要用手——左边挑手象意，右边“干”则是象声。

放着现成的“扞”不用，却另择表意不恰的“粢”，而且前者只有六划，后者有十二划；如此舍近就远，取繁弃简，真有点搞勿懂。

16世纪西班牙奥古斯丁会士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史》，无疑是西方早期汉学史上“名山之作”，藏书楼藏有此书1586年威尼斯意大利文初

了，必须从现在起就重视地下污水收集系统的建设，否则的话，我们就会陷入一个荒谬的悖论：住在江河湖泊边上金碧辉煌的高层建筑里，银行里也许有7位数的存款，但却喝不到一杯干净的水，只能每天闻闻水面上散发的臭气，这难道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吗？

也许有人会说，先污染，再治理是规律，发达国家也是这么走过来的。不能说这种观点毫无道理。但是，中国的国情特点是：人口稠密而生态系统脆弱，生态环境已经不能承受日益增多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环境现状已经触及到人口生存的底线了。如果我们有美国、俄罗斯、加拿大那样的本钱，如果中国也是地广人稀，环境稍微污染一下问题还不大，就像我们的长江，沿江十几座城市都在往长江里排污，因为长江水量大，自净能力强，水质至今还是过得去的，但如果一直朝江中猛排污，也许用不了多久就会变成第二条黄河。

我觉得，中国城市现在地面上的建筑，就是和发达国家比也不能算落后了，但地面以下的污水管道建设，却不知要落后多少年！能不能从现在开始就向希腊学习，更加重视在地面以下追赶上发达国家，先从城市的地下修建污水管道，将所有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都收集起来，经过无害化处理后再重新排放江河，然后再在小城镇、农村也开始修建污水管道，在地底下建起一张巨大的污水管道网，一张地底下的治污“互联网”，一点一滴地持之以恒地积年累月地坚持下去，这张地下“互联网”是一定可以建成的，中国的江河湖海像希腊、像所有发达国家那样清澈见底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李桂蓉从纺织厂下岗以后，应聘在这处高档住宅小区里当保洁员。她负责小区道路的清扫、垃圾的分类包装和公共设施的保养清洁。没有了计件定额，李桂蓉的工作一样认真细致，一样兢兢业业。那天，她在擦拭居委会宣传栏的时候，看到里面贴着三张彩色照片，个个面带微笑和蔼可亲，照片下面的文字说明，他们是人民代表的候选人，都是本地区领导干部。她凝视着照片许久，便向居委会主任报告：

“中间那人，住在xx号的，他一定是因为他是保洁员。”

主任从椅子上跳起来，就差没有用手捂她的嘴了。“领导放在我们这个小区选举，是对我们的信任。”主任说，“当然，向上级反映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民主权利。”李桂蓉犹豫了。下班回到家里，老工房里的邻居们又聚在昏黄的过道灯下，有的拿来了报纸鼓励她，“党在抓反腐败的工作呢。”有的说：“这就像看到小偷偷东西，你不喊，良心过得去吗？况且你以前是我们厂里劳模。”

沈浩根 书法

西方汉学萌芽于16—17世纪来华传教士的著述，400余年历经发轫期、确立期、发展期和繁荣期4个阶段，从最初的“游记汉学”演变至“传教士汉学”，最终走向“专业汉学”。汉学是中西文化汇通的产物，徐家汇藏书楼中规模庞大、体系完整的西方汉学文献正见证了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无数次冲突与对话，碰撞与融合。

16世纪西班牙奥古斯丁会士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史》，无疑是西方早期汉学史上“名山之作”，藏书楼藏有此书1586年威尼斯意大利文初

清晨，紫阳的马路还没有从夜色中醒来，我们就去思溪和延村了，中午赶到理坑。理坑位于婺源北部的边缘，是一个不足千人的山村，距婺源县城约30公里。村庄始建于元末明初。建成后，“丁才渐旺，人文顿开”。特别是到了明代晚期，村里面出了许多颇有名望的硕儒、官宦。如明万历年间工部尚书余懋衡，明天启年间吏部尚书余懋衡，明崇祯年间广东知府余自怡，清康熙年间兵部主事余维枢等。在“学而优则仕”的科举时代，理坑人循着读书、做官、光宗耀祖这个轨迹，世代奋斗，使这个僻静的小山村青史留名。这里便有了“尚书第”、“司马第”、“大夫第”等官邸。

我们的脚步落在布满岁月印痕的小巷中，雕花楼台与官邸民居，它们都是故事的载体，时光的雕塑。走进一座依然住着两位老人的雕花楼，小心翼翼地踩着陈旧狭窄的木楼梯，轻轻地穿过宽大幽暗的回廊，来到一排雕花木窗前，探头往下看，是一个深深的天井，正午明亮的光线切割着幽深的空间，光影的背后似有无数的往事向我涌来，历史就流动在理坑的空气中，生命很短，历史很长，而历史的漫长正是由无数有限的生命

构成的。我们的脚步落在布满岁月印痕的小巷中，雕花楼台与官邸民居，它们都是故事的载体，时光的雕塑。走进一座依然住着两位老人的雕花楼，小心翼翼地踩着陈旧狭窄的木楼梯，轻轻地穿过宽大幽暗的回廊，来到一排雕花木窗前，探头往下看，是一个深深的天井，正午明亮的光线切割着幽深的空间，光影的背后似有无数的往事向我涌来，历史就流动在理坑的空气中，生命很短，历史很长，而历史的漫长正是由无数有限的生命

吊老画师程潼十发先生

谢春彦

思翁去后一潭在，大树倾前九叶空。

滴水小河曲犹亮，云间何处觅幽风。

二〇〇七年七月十七日夕，晚报名记林明杰先生电告程公辞世，口占吊之耳。公乃云间人氏，与明季董其昌同邑，名潼，以号十发行。《小河淌水》为其草创风格时期名作也。今程公一去，老海派水墨画人从兹绝矣。

车的玻璃，山路漫漫似乎没有尽头，汽车像小虫在山间卖力地前行。一丛从嫣红、粉紫的杜鹃盛放在山崖上，寂静中释放着无人知晓的心事。

汽车盘旋着颠簸着，让我感到晕眩，又翻过一座山坳，眼前的一幕犹如国画的布局，午后的青山敞开宽厚的胸襟，紧紧地环绕着一丛白色的房舍。我不知道风往哪一个方向吹，只感到一种金沙沉埋的宁静，在伟岸的山间，白色的房舍显得空灵而小巧。大山无言，如慈母般的爱就这样绵延在天地间，让我想到的是地老天荒，在山脉的生命里，岁岁年年他们的相依相伴是如此的寻常，在我的眼里却是传奇的一页，永远的记忆。有位摄影的朋友下车，他说，要留下大山、我们和汽车的合影，这样的苍茫路，这样的自行，整个大山里只有我们的车，不该留下纪念吗？

汽车继续在山路上开，我以为此行不会再有意外的惊喜了，没有想到我们又一次在童话的边缘概括得很好，“古树高低屋，斜阳远近山，林梢烟丝带，村外水如环。”汽车远离了山路，驶向徽杭高速公路，落日的余晖一寸一寸地暗下来，我们又进入时光巨大的格式中，赶赴日常生活中按部就班。



民群众雪亮的眼睛和他们的监督，我们就可以有效地遏制腐败。”——看那一张张似曾相识的脸，如今变成了犯罪分子，本区的人民群众暗暗吃惊，同时，也佩服这位“根据群众举报”的举报人。小区门口的公交车站上，马路对面的菜场里，总有人议论：这个小区里的保洁员厉害，腐败分子逃不过她的眼光。奇怪的是几个月内，小区里有十多户人家搬走了，后来又有几户人家搬回来了，“我不是腐败分子，为什么要搬走？”以后的两年里，小区被评为精神文明小区。这个小区真实的名字，很多人并不知晓，人们凭想象叫它保洁小区。

从那时起，李桂蓉总觉得有人尾随着她，那些人若隐若现，有时在她工作的小区里，有时在她上下班的路上，李桂蓉心里坦然，并没有太在意。今年代会的电视报道里，李桂蓉看到了接受记者采访的反贪局长，“案件侦破后，保护举报人不受到打击报复，不受到人身伤害，是我们一项长期的重要的工作。”那个形象一下子清晰在李桂蓉的眼前，她明白了，近三年了，在她的身后，也有这位反贪局长一直在暗中保护着自己。李桂蓉的心里涌动着一股暖流。那天傍晚，李桂蓉下班的时候，又看见这位“散步”的反贪局长，她转身迎上去：“谢谢，……你就是反贪局长？”“应该谢谢你。”那人一笑，“我和你一样，也是保洁员。”

德择取卫匡国、宋君荣等多名汉学家研究权威刊物《通报》，由法国汉学家高第和荷兰汉学家施古德合编，藏书楼藏有自1890年创刊至1948年间的38卷；《皇家亚洲学会北华支会会报》由英国旅沪汉学家伟烈亚力于1858年创刊，是研究中国及亚洲地区近代历史的珍贵资料，藏书楼藏有此刊1858—1948年间共73卷；此外，数十种的《汉学杂编》从书更丰富了藏书楼的汉学珍藏。

明清读一十日谈篇《报人戈振和藏书楼的情缘》。徐家汇藏书楼还系统收藏了一批难得的西方汉学研究刊

山里花香

王雪瑛



保洁员

吴建国

案办理。你为党和人民立了一功，同时也请你注意保护自己。”下面留了四个电话，说明：“如遇打击报复请打电话告诉我们，其中手机是24小时开着的。”

几个月后，电视里报道：“根据群众举报，本区破获一起建国以来最大的贪腐案，涉案的十三名被告全部被判刑。”报道最后说：“办公室里腐败是隐蔽的，腐败分子往往在他们的住处露出种种蛛丝马迹。只要有人

之牛耳，耶稣会士杜赫德于1735年在巴黎出版的法文巨著《中华帝国全志》4卷，是这一时期的一部扛鼎之作，藏书楼藏有此书巴黎法文初版、伦敦英文初版等多个版本。杜赫

之牛耳，耶稣会士杜赫德于1735年在巴黎出版的法文巨著《中华帝国全志》4卷，是这一时期的一部扛鼎之作，藏书楼藏有此书巴黎法文初版、伦敦英文初版等多个版本。杜赫

之牛耳，耶稣会士杜赫德于1735年在巴黎出版的法文巨著《中华帝国全志》4卷，是这一时期的一部扛鼎之作，藏书楼藏有此书巴黎法文初版、伦敦英文初版等多个版本。杜赫

之牛耳，耶稣会士杜赫德于1735年在巴黎出版的法文巨著《中华帝国全志》4卷，是这一时期的一部扛鼎之作，藏书楼藏有此书巴黎法文初版、伦敦英文初版等多个版本。杜赫